

《拉丁美洲研究》创刊40周年专题

巴西及其视域中的“多个中国”： 巴西学术界如何理解中国*

[巴西] 傅一晨

内容提要：充分理解分析对象需要信息和知识。然而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掌握信息并不一定代表掌握知识。中国和巴西在信息交换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目前我们仍需克服知识的障碍。本文分析了19世纪末以来巴西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意象建构。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建构了三个有关中国的意象：古代中国、共产主义中国、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一个具备经济和政治能力、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霸权国家的新中国意象已在巴西出现。然而，由于巴西缺乏一支优秀的汉学研究团队，因此即便获取的中国信息数量有所增加，巴西仍无法充分理解中国。尽管巴西拥有不少优秀的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但却没有能够真正理解21世纪中国的汉学家。本文就培养巴西汉学家，并使其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巴西 中国 信息 意象建构 汉学家

作者简介：傅一晨 (Felipe Camargo Gaiotto)，博士，毕业于巴西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 (UFRGS) 国际战略研究专业，现为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9) 04-0040-20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肯尼迪政府的拉美公共外交政策及影响” (编号: HB19SL001)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郭存海副研究员和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宋晓丽博士对本文的审读和意见，文章的疏漏和不足概由作者负责。

当哥伦布抵达当今美洲大陆时，他深信自己找到的是另一条通往亚洲大陆之道，有可能见到中国的皇帝——“大汗”。究其原因，哥伦布有一天听见当地人谈及“Caniba”，便将该词误解为“大汗的臣民”，即中国人。然而欧洲的探险者们并不知道，Caniba 其实是对加勒比地区居民的称呼。^①

在欧洲“大发现”时期，还有一则故事也反映了欧洲人对他者缺乏了解并充满偏见。不过这则故事版本众多，因而颇有争议。据说航海者在 1546 年抵达当今的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他们向当地人询问地名，得到的回答是“尤卡坦”，于是这个词被当作地名沿用至今。然而在玛雅语中，“尤卡坦”意为“我听不懂你的语言”，西班牙人命名当地之词竟是由于一场无法相互理解的对话而形成的。

细致的读者可能辩驳：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如今我们有机会获取各种信息，因此几乎不会出现上述错误和误解。或许他们说得没错，但对于信息的力量，无论真实与否，人们总显得有些天真。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有必要区分针对特定分析对象的信息与知识。身处“文明的冲突”不断冲击的时代，我们必须弄清什么是事实信息，以及历史社会的真相是什么。

本文旨在分析 19 世纪末以来巴西学界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我们因此有必要分析巴西学者如何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概括而言，巴西学界已出现有关“多个中国”的认知，但学者们普遍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又或许这些巴西人眼中的“多个中国”的产生原因正是中国本身。此外，还有两个现象需要我们去解释。第一，通过分析发现，巴西学界至少形成了三个有关中国的意象，即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国、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和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尤其在研究国际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新兴大国时，后两种意象普遍受到巴西学者的关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巴西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结构？第二，为何巴西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的汉学流派？如今的巴西拥有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但尚没有巴西汉学家能领悟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

由于很难对所有巴西学者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认知进行分析，本文为此采用了另一标准，即通过阅读相关文章、报告、论文和书籍，以及与尽可能多

^① 哥伦布在旅行日记里曾写道：“正如我此前所说，Caniba 指的就是‘大汗的臣民’，他们一定距离这里非常近了。”转引自 Tzvetan Todorov,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El Problema del Otro*, Mexico D. F.; Madrid: Siglo Veintiuno, 1998, p. 39. 托多罗夫证实，当地居民自称加勒比人（Caribas），但在旅行日记中，哥伦布将其称为“Canibas”。

的巴西学者（绝大多数学者将在文中被提及）进行对话交流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巴西多数对大众思想有影响力的学者都会关注中国话题。

本文的正文共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自19世纪末以来巴西国内中国研究的形成及演变，意在向读者展现巴西学界如何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第二部分将阐明，尽管巴西目前已克服信息获取方面的障碍，但有关中国的信息仍难以在民众和学者之间广泛传播。本文最后强调培养巴西汉学家的重要性。

一 巴西学者对中国认知的形成

正如前文所述，错误信息和预先形成的对他者的知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本部分将梳理巴西汉学家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出版物，进而分析19世纪末以来巴西学者如何形成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认知。

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小阿尔梅达（Francisco Antônio de Almeida Junior）或许是第一位记录中国的巴西人。他在随法国科考团前往日本期间曾到访中国部分沿海城市，因此在他1874年的旅行日记中，“China”首次以国家的身份出现，而不仅仅是东方商品的代名词。^①小阿尔梅达的旅行日记后被收录在《从法国到日本：关于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居民历史、习惯和风俗的旅行记叙及描述》一书中，并于1879年在里约热内卢出版。巴西历史学家贝尔南迪诺·阿伯鲁指出，小阿尔梅达在旅行日记中描述了中国的人文情况，同时还记录了一些对科考沿途各地社会政治问题的评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阿尔梅达的描述受到当时法国汉学流派思维方式的影响。^②

19世纪末，一个颇具争议的国内问题引起巴西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当时由于欧洲移民抵达巴西后受到当地土地所有者奴隶般的对待，欧洲各国政府便不再希望本国公民前往巴西，移民群体本身也更倾向于前往美国或其他欧洲殖民地。声名狼藉的巴西为应对其领土上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将目光投向

^① Maria do Carmo Strozzi Coutinho (ed.), *Cadernos do CHDD*, No. 12, Brasília: CHDD/FUNAG, 2012. <http://funag.gov.br/chdd/index.php/cadernos-do-chdd/105-cadernos-do-chdd-n-25>. [2019-03-15]

^② Bernardino da Cunha Freitas Abreu, “Apresentação”, em Maria do Carmo Strozzi Coutinho (ed.), *Cadernos do CHDD*, No. 12, Brasília: CHDD/FUNAG, 2012. <http://funag.gov.br/chdd/index.php/cadernos-do-chdd/105-cadernos-do-chdd-n-25>. [2019-03-15]

中国。出于现实需要，巴西政府渴望引进中国劳动力以取代国内黑奴。

在替代黑奴的问题上，巴西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之间曾有过激烈的辩论。1808年，葡萄牙王室来到巴西时就曾经讨论过中国移民问题，但到了1879年，它成了一个“中国人种问题”（Chinese Question），参与这场辩论的包括巴西废奴主义者若泽·德帕特罗西尼奥（José do Patrocínio）、若阿金·纳布科（Joaquim Nabuco）和金蒂诺·博卡伊乌瓦（Quintino Bocáiuva）。^① 巴西精英认为，中国人是介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中等人种”，因此，引进中国人无法解决巴西迫在眉睫的民族建构问题。^② 偏见总是惊人的相似。其实巴西人早已熟悉从东方运来的中国商品，例如瓷器和茶叶；巴西知识分子也对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游历中国的故事有所耳闻。但正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犹太教和基督教主导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这使得巴西人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充满了异域色彩。这本该是一种对他人的好奇，却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后来，中国劳动力并没有移民到巴西，但从那时起，正如安德烈·布埃诺所说，巴西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应当成为巴西社会形态的参考，还是反面案例？^③

有关中国移民的问题还促成了巴西第一个访华使团。1880—1882年，该使团在中国停留，旨在与中方缔结友好关系及商贸和航海条约。外交使团以及小阿尔梅达的科考团为巴西官员研究中国提供了灵感，例如，外交官李诗圃撰写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为《中国与中国人：旅程回忆录》（1888年）和《第四类中国人：中国与中国人的延续》（1894年），后者专门叙述中国移民问题。^④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Gilberto Freyre）曾对巴西完全西化的社会形态提出异议。巴西的文化背景实际上融合了欧洲、非洲和土著文化，同时，葡萄牙与东方的间接接触也为巴西带来了东方文化的影响，

^① Jeffrey Lesser, *A Invenção da Brasilidade: Identidade Nacional, Etnicidade e Políticas de Imigração*, São Paulo: Editora Unesp, 2001.

^② Rogério Akiti Dezem, *Matizes do Amarelo: A Gênese dos Discursos Sobre os Orientais no Brasil (1878 - 1908)*, São Paulo: FAPESP/Humanitas - USP, 2005.

^③ André Bueno, *Caminhos para um Sinologia Brasileira*. https://www.academia.edu/37557215/Caminhos_para_uma_Sinologia_Brasileira. [2019 - 03 - 15]

^④ Henrique Carlos Ribeiro Lisboa, *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 Rio de Janeiro: FUNAG, 2016. http://funag.gov.br/biblioteca/download/1142-a_china_e_os_chins.pdf; *Os Chins do Tetartos: Continuação de a China e os Chins*, Rio de Janeiro: FUNAG, 2018. <http://funag.gov.br/biblioteca/download/1251-os-chins-do-tetartos-funag-chdd.pdf>. [2010 - 11 - 01]

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然而直至几年前，一本论述东方对巴西社会形态影响的书籍——《热带中国》，才首次在巴西问世，这本著作是弗莱雷一系列讲座、论文和书目章节的汇编。^①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虽以中国为题，但比起中国文化，书中有更大篇幅讲述了印度文化如何影响巴西社会形态。

巴西汉学家、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若泽·罗伯托·特谢拉·莱特（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继续了弗莱雷的研究，并实现了对后者的超越。莱特坚持认为，中国对巴西文化的影响远大于弗莱雷的描述。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对巴西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即便这种影响在1810年后开始减弱，但始终被保留在巴西文化中。^②莱特同时指出，尽管已有少数国内外学者和艺术史学家表示，有兴趣研究中国对米纳斯吉拉斯州殖民时期绘画以及对巴西传统建筑中某些特征的影响，但尚未有系统且全面的研究来探析中国对巴西文化的影响。

巴西外交官、汉学家里卡多·若佩特（Ricardo Joppert）博士毕业于巴黎第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他不仅分析了巴西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影响，还研究了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因而被巴西主流汉学家布埃诺和塞维利诺·卡布拉尔（Severino Bezerra Cabral Filho）等人视为巴西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若佩特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著有《中国永远美丽》和《中国瓷器》等。^③布埃诺断言，若佩特是少数几个试图通过文化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巴西学者之一。^④

巴西汉学家、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安德烈·布埃诺也是当前巴西国内少数致力于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之一。他还开设了一个葡萄牙语博客，取名为“Sinografia”（“中国投影”），并在平台上提供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学术文章、论文和著作。布埃诺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解和传播

^① Gilberto Freyre, *China Tropical: E Outros Escritos Sobre a Influência do Oriente na Cultura Luso - Brasileira*, Rio de Janeiro: Global Editora, 2015.

^② 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Influências, Marcas, Ecos e Sobrevivências Chinesas na arte e na Sociedade do Brasil*, 1992, 628 f. Tese (Doutorado) - Curso de Instituto de Artes, Universidade de Campinas, Campinas, 1994. 随着1808年后巴西开埠，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正如弗莱雷所述，巴西不再具有“东方”（印度、日本和中国）特征，它成了一个西方国家并具有欧洲（英国和法国）的习惯和特征。

^③ Ricardo Joppert, *A China é Sempre Formosa*, Rio de Janeiro: Fleming, 1958; *Alicerce Cultural da China*, Rio de Janeiro: Avenir, 1979; *A Porcelana Chinesa*, Rio de Janeiro: Artlivre, 1985.

^④ André Bueno, *Caminhos para um Sinologia Brasileira*. https://www.academia.edu/37557215/Caminhos_para_uma_Sinologia_Brasileira. [2019-03-24]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编撰了《中国历史百文》和《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本》等介绍中华文明的书籍。^①此外，他也常在巴西各高校和媒体上批判巴西人对中国的（错误）常识。

尽管布埃诺本人对中华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正如他在博客中写道，在巴西传播古代中国知识如同在沙漠中布道。布埃诺翻译的文章和书籍多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撰写的经典，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引领着人类知识的发展演变。相比于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东方学”（Orientalism），布埃诺认为中华文明促进了整个人类知识的演进，因此他希望通过葡语译本，将《史记》《山海经》以及周朝、秦朝和西汉时期的其他经典引入巴西。^②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巴西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开始多元化。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不再只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千年文明，另一个“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象也逐渐形成，甚至在几年后又出现了“提供资本机会的中国”的新意象。目前，由于在国际政治体系研究中出现“新兴大国”议题，后两种意象受到巴西学者更多的关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一些著作被翻译成葡萄牙语；与此同时，巴西学者也开始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的书籍。1980年后，一些法国和美国的出版物被译成葡语，并在未经巴西政府审查的情况下印刷出版。然而，正如弗拉基米尔·波马尔（Wladimir Pomar）所述，这些书籍的出版数量有限，并且只涵盖了中国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的一部分。^③

奥斯尼·杜瓦特·佩雷拉（Osny Duarte Pereira）在巴西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杜瓦特是一名法官，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关注巴西的未来发展，出版了几本关于巴西主权以及两本有关中国的书籍。1956年，他出版了《我们与中国》。^④1957年，他撰写了一份自己游历亚洲国家的报告，并以《今日中国》为名发表。^⑤布埃诺指出，杜瓦特是第一位将

① André Bueno, *Cem Textos de História Chinesa*, União da Vitória; FAFIUV, 2011; *Textos de História da China Antiga*, Rio de Janeiro; E-book, 201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yKChEwj87BgOEoyMUFFaG5jNOE/view>. [2019-03-24]

② Edward W. Said, *O Oriente como Invenção do Ocidente*,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③ Wladimir Pomar, *A Revolução Chinesa*, São Paulo; Editora Unesp, 2003.

④ Osny Duarte, *Nós e a China*, Rio de Janeiro; Irmão Pongetti, 1956.

⑤ Osny Duarte, *A China de Hoje*, Rio de Janeiro; Irmão Pongetti, 1957.

中巴两国经济发展进行类比的巴西人。在杜瓦特看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可以成为巴西学习的案例，从而实现其强国理想。^①

弗拉基米尔·波马尔也曾向巴西民众介绍中国。作为1962年巴西共产党(PCdoB)和1980年巴西劳工党(PT)的创始人之一，波马尔试图揭开巴西对中国意象的神秘面纱。^②他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中国之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19世纪之龙》《中国革命》以及《中国：打破神话》。^③弗拉基米尔·波马尔是巴西的共产党(PCB)领导人佩德罗·波马尔之子，后者曾于1956年作为巴西代表团成员之一被派往中国参加中共八大。^④在论述20世纪中国革命的著作中，波马尔阐明了中国古代及外国列强侵略时期中国人民起义的本质。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波马尔的书籍、文章和论文都意在揭示，西方世界的集体认知中普遍存在一种永恒的二元对立，这种情况在巴西也不例外。正如波马尔在《中国之谜》一书中所述，无论站在左翼还是右翼立场，西方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存在曲解。

巴西坎迪德·门迪斯大学巴西中国—太平洋研究所(IBECA)所长、巴西军事学院常任理事塞维利诺·卡布拉尔教授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潜心研究中国。他在《中国：一个巴西视角》中阐述了历史变迁与中国形势、中巴关系，以及中国同葡语国家的合作。此外，对于可能形成的世界多极格局，卡

^① André Bueno, *Caminhos para um Sinologia Brasileira*. https://www.academia.edu/37557215/Caminhos_para_uma_Sinologia_Brasileira. [2019-03-25]

^② 请不要将巴西共产党(PCdoB)与巴西的共产党(PCB)混淆。1962年，由于不满时任巴西的共产党领导人儒利奥·普列斯特斯(Luís Carlos Prestes)的政党改革，部分政党成员从“巴西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组建了新政党，取名为“巴西共产党”。

^③ Wladimir Pomar, *O Enigma Chinês: Capitalismo e Socialismo*, 2nd edition, São Paulo: Editora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15. <https://fpabramo.org.br/publicacoes/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7/05/EnigmaChines2015-web.pdf>. Editora Alfa Ômega released the first edition in 1987; *China, o Dragão do Século XIX*, São Paulo: Editora Ática, 1996; *A Revolução Chinesa*, São Paulo: Editora Unesp, 2003; *China: Desfazendo Mitos*, São Paulo: Editora Página13, 2009. <http://www.editorapagina13.org.br/download/china-desfazendo-mitos-wladimir-pomar/>. [2019-04-05]

^④ 另一则故事更能体现波马尔家族与中国人民的密切关系：佩德罗·波马尔于1972年代表巴西共产党(PCdoB)到访中国，当时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转达了巴西共产党计划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是巴西共产党建立阿拉瓜亚游击队(Araguaia Guerrilla, 1967—1974年)的灵感来源。1976年，巴西军事独裁者下令杀害了佩德罗·波马尔。

布拉尔认为，巴西和中国都自认为是国际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大国。^①

2004年，贝鲁赛·贝鲁奇（Beluce Belluci）教授编撰了一本书，意在向巴西民众介绍“一个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取名为《开眼看中国》。^②卡布拉尔也参与了此书的撰写，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一些机制和途径的构想，以此强化中巴两国在科学、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对话。^③《开眼看中国》主要收录了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宏观政治领域撰写的论文，涵盖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教育、农业和安全等话题。卡布拉尔和波马尔是仅有的两位外国作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巴西学者长期与中国学者有直接接触。

谈到巴西的中国研究，我们还需提及一位学者，那就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教授保罗·维森蒂尼（Paulo Fagundes Visentini）。维森蒂尼并非汉学家，但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在巴西国际政治领域得到普遍认可。维森蒂尼精于研究全球政治体系中边缘国家的外交事务，他的著作和论文主要研究参与1955年万隆会议的国家，以及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立。目前，维森蒂尼是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巴西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心（NERINT）的协调员。该机构在首届“中国—巴西研讨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安全”研讨会后出版了相关文集，聚焦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动态。^④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巴西中国研究学者还包括安德烈·库尼亚（André Moreira Cunha）^⑤

① S. B. Cabral Filho, *China: Uma Visão Brasileira*, 1st edition,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e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Estudos da China e Ásia Pacífico (IBECAP), 2013.

② Beluce Bellucci (org.), *Abrindo os Olhos para a China*, Rio de Janeiro: Universidade Candido Mendes (UCAM), 2004. <http://bibliotecavirtual.clacso.org.ar/Brasil/ceaa-ucam/20121123114130/abrido.pdf>. [2019-04-29]

③ Severino B. Cabral Filho, “O Diálogo Brasil – China: Perspectivas para o Século XXI”, em Beluce Bellucci (org.), *Abrindo os Olhos para a China*, Rio de Janeiro: Educam, 2004, pp. 297 – 316.

④ Marco Cepik (org.), Dossiê China: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e Segurança Internacional, em *Revista de Sociologia Política*, Curitiba, Vol. 19, suplementar, pp. 9 – 29, 2011. <https://www.ufrgs.br/cegov/publicacao/v/21?n=Dossi%C3%AA%20China%203A%20desenvolvimento%20econ%C3%B4mico%20e%20seguran%C3%A7a%20internacional>. [2019-04-29]

⑤ André Moreira Cunha, *A Economia Política do “Milagre Chinês”*, 2008. <https://lume.ufrgs.br/handle/10183/30303>; André Moreira Cunha, et al., “A Diplomacia do Yuan Fraco”, em *Revista de Economia Contemporânea*, Rio de Janeiro, Vol. 11, No. 3, pp. 525 – 562, 2007. <http://repositorio.unicamp.br/bitstream/REPOSIP/38283/1/S1415-98482007000300006.pdf>; *Brazils Development Pattern in a Sino – Centred Worl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2014. https://www.anpec.org.br/encontro/2014/submissao/files_1/i6-cea65d8b3254c831f819f2b60197ca7a.pdf. [2019-03-13]

和马尔科·塞匹克 (Marco Cepik)^①, 两人均为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教授, 分别从事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 中国正雄心勃勃地征服世界, 并企图超越美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者。维森蒂尼对此并不赞同。正如他所说, 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中国恐惧症的表现”。^② 维森蒂尼指出, 基于同非洲国家建立的关系, 新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开启了新篇章, 并实现了重新谋求主权和发展的奋斗目标, 那才是“最新的中国”(Newest China)的开端。为此, 中国希望避免“霸权”, 无论是美国霸权, 还是可能形成的“中国霸权”。

维森蒂尼曾在一篇文章中揭开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施行“帝国主义”的迷思。在一篇名为《中非关系: (许多) 迷思与 (一些) 现实》的文章中, 维森蒂尼抨击西方大国坚持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实行“中式新殖民主义”。^③ 另一方面, 尽管欧美学者的研究经常批判这一事实, 但非洲人民也早已明白中国的意图, 即与非洲大陆维持长期的贸易和发展联系。因此, 当中国“再次崛起”时,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在“国际体系中的亚洲及其中国枢纽”框架下来分析的亚洲区域现象, 而是一种植根于长期历史的现象, 很难通过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④ 了解亚洲国家的历史背景对于解开中国谜题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 部分巴西学者还看到了一个提供资本机会的中国意象。这样的中国代表着一种经济模式和一个对巴西商品极具吸引力的市场, 但同时也给巴西国内的商品生产带来竞争压力。总体而言, 中国已将自身打造为多元化的出口平台, 并且仅考虑其国内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这一经济模式就

^① Marco Cepik and Gustavo Möller, “N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as Networks: Power Distribu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isk in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in *Brazi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 No. 1, pp. 1–4, 2017. <http://dx.doi.org/10.1590/1981-3821201700010001>; Marco Cepik, “A Política da Cooperação Espacial Chinesa: Contexto Estratégico e Alcance Internacional”, em *Revista de Sociologia Política*, Curitiba, Vol. 19, pp. 81–104, 2011. <https://lume.ufrgs.br/handle/10183/78581>; Marco Cepik and Felipe Machado, “O Comando do Espaço na Grande Estratégia Chinesa: Implicações para a Ordem Internacional Contemporânea”, em *Carta Internacional*, Belo Horizonte, Vol. 6, No. 2, pp. 112–131, 2011. <https://www.cartainternacional.abri.org.br/Carta/article/view/42>. [2019-03-13]

^② Paulo Visentini, “A Novíssima China e o Sistema Internacional”, em Marco Cepik (org.), *Revista de Sociologia Política*, Curitiba, Vol. 19, suplementar, pp. 9–29, November 2011.

^③ Paulo Visentini and Guilherme Z. Oliveira, “As Relações Sino-Africanas: (Muitos) Mitos e (Algumas) Realidades”, em *Século XXI*, Porto Alegre, Vol. 3, No. 1, Jan. – Jun. 2012.

^④ Paulo Visentini, “A Ásia no Sistema Internacional e a China como Pivô”, em *Conjuntura Internacional*, Belo Horizonte, Vol. 11, No. 1, pp. 83–91, 2014.

值得借鉴。上述中国意象的形成，归功于私人银行、咨询公司、多边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投资企业，因而是一个单纯以数字来描绘的中国形象。客户大多通过电子数据、表格，以及各式各样的图表来了解中国及其人民。与此同时，一群巴西学者也在自问，为何巴西无法取得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经济学家、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卡洛斯·梅代罗斯（Carlos Medeiros）是试图揭开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先驱之一。^① 他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笔耕不辍，并且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张，他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进而分析了中国经济扩张对拉美和亚洲的影响。^② 目前，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在国际体系扩张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重点聚焦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③

与此同时，正当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还专注于研究本国项目时，一本讲述 21 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秩序中崛起及其产生的国际变革的著作在巴西问世。这本名为《新全球环境中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书籍，是巴西学界在理解中国对美国、欧洲、亚洲邻国、俄罗斯、印度及巴西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为世界做出的独特贡献。^④ 此书意在理解中国的发展，明确中国在新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探讨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参与撰写此书的学者是巴西各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个渴望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然而，尽管这本书重要性突出，但出于时效性问题，它已显露不足。

遗憾的是，巴西至今尚未能组建一支汉学研究团队，其原因在于巴西国内汉学家人数有限。我们至多可以这样推测，随着巴西从中国学者那里获取更多的直接信息，以及中巴两国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掌握的

① Carlos A. Medeiros, “O Ciclo Recente de Crescimento Chinês e seus Desafios”, em *Observatório da Economia Global*, No. 3, 2010. http://www3.eco.unicamp.br/cecon/images/arquivos/observatorio/OBSERVATORIO_3.pdf. [2019 - 04 - 13]

② Carlos A. Medeiros and Maria R. V. P. Cintra, “Impacto da Ascensão Chinesa sobre os Países Latino - Americanos”, em *Revista de Economia Política*, Vol. 35, No. 1, pp. 28 - 42, janeiro - março 2015; Carlos A. Medeiros, “A China como um Duplo Polo na Economia Mundial e a Recentralização da Economia Asiática”, em *Revista de Economia Política*, Vol. 26, No. 3, pp. 381 - 400, julho - setembro 2006.

③ Carlos A. Medeiros and Esther Majerowicz,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ase of Semiconductors”, em *Revista Economia Contemporânea*, Vol. 22, No. 1, pp. 1 - 28, jan. /abr. 2018.

④ Rodrigo Pimentel Ferreira Leitão, et al. (org.), *A China na Nova Configuração Global: Impactos Políticos e Econômicos*, Brasília: IPEA, 2011, pp. 13 - 19. http://www.ipea.gov.br/portal/images/stories/PDFs/livros/livro_achinaglobal.pdf. [2019 - 04 - 19]

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信息将会更加准确。这或许能极大提升巴西的中国研究能力，同时扩大巴西在该领域的杰出学者数量，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领悟中国。

巴西学者还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汉学流派。那么，创建巴西汉学是否必不可少？巴西学者目前的学术成果难道还不足以让巴西人领悟中国？在之后的两节中，我们就将分析巴西学者在传播中国信息时存在的局限性。

二 巴西国内“多个中国”意象的构建

在当今社会，我们无须花大量笔墨去阐明虚假信息的威力。它能按照传播者的利益需求将真实情况神秘化，或是凭空捏造报告、制作真假参半的内容，进而塑造社会真相。我们在前文介绍了巴西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认知的总体情况，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正在出现，这可能超越了巴西人对中国的传统认知。这种新意象将使中国脱离巴西的东方学研究。^①

一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巴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化。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玛丽亚·戈恩（Maria da Glória Gohn）曾撰写过一份报告，很好地体现了巴西中产阶级对中国普遍抱有的预想和偏见。1999年，戈恩到上海参加一场关于城市化的科学大会。当时她认为能看到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变革的结果她还不太清楚。但当戈恩接触到真正的现实中国后，她坦言道，“事实上我现在才发现，自己拥有着如西方世界般的想象，对东方国家（中国）充满了刻板印象：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长相和衣着相似，到处排着长队，没有店铺，没有商场，也没有书店和报摊，交流困难，等等”^②。尽管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变，但正如戈恩亲眼见到中国前所认为的那样，巴西对中国及其人民仍然抱有异乎寻常的曲解。

因此，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为何需要将中国研究从巴西东方学研究中抽离出来。显而易见，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该国在全球政治中日益重要的存在，

^① “东方学”指对现代或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并由此对东方文明进行描述、模仿和神秘化。鉴于东方学的诞生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因而学者易对东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形成刻板印象。

^② Maria da Glória Gohn, *Imagens da China Hoje*, Rev. online Bibl. Prof. Joel Martins - v. 1, n. 1, out. 1999, p. 2. http://repositorio.unicamp.br/bitstream/REPOSIP/118708/1/ppec_538-593-1-PB.pdf. [2019-04-19]

是造成巴西学者对中国研究兴趣不断增长的原因。除此之外，目前巴西民众从本国学者那里获取的中国信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已开始从中国直接传递给巴西人民。

语言是阻碍中巴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一大问题，英语目前仍是双方沟通交流的主要语言。然而克服这一障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巴两国人民都致力于学习彼此的语言，尤其是中国高校开设的葡萄牙语课程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巴西的学校尚未开设汉语课程，仅有个别例外，如圣保罗大学提供本科汉语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巴西高校开设中文学院，那么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对真实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及汉语进行正确的研究。例如，圣保罗大学将要举办一场仅有巴西学者参与的学术活动，专门用来探讨中国作家鲁迅视角下的中国传统，这不再是过去常见的东方文学赏析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巴西几所主要高校的孔子学院也通过提供语言课程和介绍中国文化，试图拉近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从而克服上述障碍。然而，孔子学院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在2019年上半年，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揭牌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系巴西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的产物。借助中巴学者交流互通，两国在克服研究障碍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同样，为克服语言障碍和空间距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1960年4月15日起正式播出葡萄牙语节目。而在巴西方面，总部位于首都的巴西利亚超级调频电台和位于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阿雷格里港的巴西瓜伊巴电台，每天都会播放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萄牙语部提供的五分钟简讯，内容为中国当日主要新闻。此外，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葡语网站上，用户可以便捷地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尽管巴西民众能够在互联网上轻松访问上述媒体，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源持续关注中国的日常生活。信息传播仍旧是一大问题。另一方面，巴西学者也试图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情况。如前文所述，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的布埃诺教授将中国古代思想经典译成了葡萄牙语。此外，对中国感兴趣的巴西民众还有机会收到一份《每周中国通讯》。“书面”（Shūmiàn）作为一个网络通信平台，旨在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创造更多交流机会，从而优化中国与拉丁美洲，尤其是中国与巴西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然而它不仅仅是一个由中国媒体和学者提供信息的平台，世界各地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新闻信息都汇聚于此。“声田”（Spotify）是一个集音乐、播客和视频于一体的流媒体

服务平台。2019年上半年，来自巴西的陆依莎（Luiza Duarte）、安德烈·索阿雷斯（André Soares）和蒂亚戈·德阿拉高（Thiago de Aragão）三人在“声田”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播客。然而，由于大多数巴西民众无法获取这些信息，上述媒体对中国信息的传播能力仍非常有限。

值得一提的还有巴西中国研究网络（RBCINA），该网络由巴西各界人士组成，包括教授、学生、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商人和记者。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曾研究中国或与中国有某种关联，网络内的成员每天都会交流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而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通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巴西人。2018年，巴西中国研究网络在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会议，第二届会议将于2019年10月在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举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尽管我们能从中国和巴西两条渠道获取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巴西学生在撰写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时，很少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在巴西的顶尖高校，如圣保罗大学、圣保罗州立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等，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时也都公开引用欧美学者的分析。近年来，尽管巴西有关中国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其中参考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欧美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巴西未来的高校教师和思想领袖很少能从中国学者那里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

不过对于上述情况，的确也存在一些例外，只是它的前提条件值得我们关注。在巴西，多数参考中国文献的研究成果都出自赴巴参加研究生项目的中国留学生。例如李成（音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①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大国竞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巴贸易关系。然而，只有当巴西研究人员掌握一定水平的汉语，或是当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时，这些来自中国的文献才会被引用。圣保罗州立大学研究生廖思（音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②

^① Li Cheng, *Transições na Economia de Mão de Obra Excedente: Um Estudo de Caso da Mobilidade da Mão de Obra Rural na China*, 2014, p. 158, Dissertação (mestrado) –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Instituto de Economia, Campinas, SP. <http://www.repositorio.unicamp.br/handle/REPOSIP/286402>. [2019-03-01]

^② Liao Si, *Parceria Brasil – China: A Questão do Petróleo*, 2015, 104 f. Dissertação (mestrado) – UNESP/UNICAMP/PUC – SP, Programa San Tiago Dantas, 2015. <http://hdl.handle.net/11449/134098>. [2019-03-01]

过去十年间，圣保罗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关注中国经济，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17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以及巴西的中国移民问题。然而这些研究同样很少引用中国学者的文献。即便有部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在研究中被提及，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但其引用来源往往是美国和欧洲的学术期刊。为数不多的例外是巴西学者埃利亚斯·雅布尔^①和英提·门多萨^②的博士学位论文。

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领域。2018年，布鲁诺·杜瓦特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习近平与中国的政治体制》。^③该论文旨在阐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国家制度建设中的挑战，并论述习近平就职以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杜瓦特有不少参考文献出自中国学者和中国的学术期刊。同时，作者也借用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制度化程度标准来评估中国。^④此外，罗萨娜·马沙多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中国—巴拉圭—巴西路线上中国商品的正式和非正式生产及流通体系。^⑤为了解中国商品的生产及其背后的人际关系，马沙多在中国广东进行了田野调查，2010年被巴西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生联合会（ANPOCS）授予巴西最佳社会科学论文。

或许，利用中巴两国的学术出版物就同一主题搭建知识交流的平台能成为克服上述种种困难、推动优质信息传播的可行方法之一。例如，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

① Elias Marco Khalil Jabbour, *Projeto Nacional, Desenvolvimento e Socialismo de Mercado na China de Hoje*, São Paulo, 2010. Tese (Doutorado em Geografia) – Faculdade de Filosofia, Letras e Ciências Humanas,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São Paulo, 2010.

② I. S. Mendoza, *Poesia e a Formação do Erudito na China Clássica – Transposição Cultural do Chinês ao Português*, 2013, 105f. Tese (Doutorado) – Faculdade de Educaçã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São Paulo, 2013.

③ Bruno Kern Duarte, *Xi Jinping e o Sistema Político da China*, 2018, 116 f. Dissertação (Mestrado) – Curso de Programa de Estudos Estratégicos Internacionais,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 (UFRGS), Porto Alegre (RS), 2018. <https://lume.ufrgs.br/handle/10183/193013>.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Rosana Pinheiro Machado, *Made in China: Produção e Circulação de Mercadorias no Circuito China – Paraguai – Brasil*, 2009, 332 f. Tese (Doutorado) – Curso de Antropologia Social,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 (UFRGS), Porto Alegre (RS), 2009. <https://lume.ufrgs.br/handle/10183/16895>. [2019-03-02]

双方学者曾围绕“中等收入陷阱”这一主题进行经验交流，并于2013年在巴西发行了两卷本的葡语文集。^①书中收录了两国学者撰写的论文，反映了中巴两国的具体情况。这一经验交流模式还可以推广到其他知识领域，从而实现信息的优化。

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出版物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两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构成开展经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避免错误信息，而非为了建立模式让彼此复制。中国与巴西现实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两国在特定问题上进行知识互换，尤其当双方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时，交流有助于寻找合适的替代方案。

不同于以往，如今的巴西更容易获取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信息。而此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播这些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知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巴西掌握的事实信息以及知识建构过程。在继续分析相关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消除可能存在的认知误区，这对于理解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至少存在三类研究主体会对客体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第一类，对客体的社会历史构成有意识判断的主体；第二类，意识形态研究者^②；第三类，客体主观的辩护者。对于最后一类主体，本文将不做分析，因为这类“研究者”本身充满各种偏见与预想。他们的分析更倾向于形成错误的政治表达，而非构建有关某些问题的科学认知。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语言障碍或是参考资料的局限性，巴西国内许多学术论文和报纸文章都忽视了中国近年来社会形态建构过程的特殊性。在描写中国人民及其生活方式的书卷中，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也已黯晦消沉。同时，由于巴西学者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欧美国家的知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和美国固有的偏见很大程度上造成巴西国内出现了“多个中国”的意象。对此，中国正努力改变这一状况。

三 超越巴西的中国问题专家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讲述的对他人缺乏了解的历史案例。如果

^① Lia Valls Pereira, et al. (org.), *A Armadilha da Renda Média: Visões do Brasil e da Chin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gv: Ibpe, 2013, 1v e 2v.

^② 意识形态分析只关注研究对象的表象。

我们只获取有关信息，虽然这至关重要，但我们还不足以了解他人。根据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描述，哥伦布醉心于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游记和皮耶·戴利（Pierre d'Ailly）的世界图像理论。^①除了他自己脑海里对世界预先设定的认知，哥伦布不关心周围任何人。他十年间曾四次到达美洲，每一次都希望见到中国的皇帝。哥伦布确信自己就在中国，因为上帝派他去那里引导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哥伦布的神秘主义观点和先入之见是他认知上的一大障碍。按托多罗夫的话来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却没有发现美洲人”^②。同理，中国和巴西分别发现了对方，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仍需继续“发现”两国人民。并且，仅仅获得真实的信息还不足以理解他人。

相似地，葡萄牙传教士在明清时期就曾多次试图与中国官员保持联系，但中国政府限制其在国内自由活动，澳门是他们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城市。不过，在葡萄牙传教士的执意坚持下，其中两人获准在中国领土上游历，尽管依旧没有取得官员们的信任。

究其原因，欧洲传教士对当时的中国人存在误解，因而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两位传教士曾将中国人与日本人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既然佛教徒在日本颇有威望，那么中国社会又怎会不接受佛教习俗呢？因此，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传教士们开始依照佛教僧侣的形象穿着和表现。但不久之后，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精英大多是儒学思想的追随者。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中时，传教士们便放弃了原先的佛教打扮，转而穿上中国学者的丝质长袍，还留起了头发和胡须。^③

“成为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一人类学辩论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除极少数例外，大多巴西学者都不赞成此类辩论。或许这是中国学者需要研

^① 法国神学家、地理学家皮耶·戴利（1351—1420年）认为，大陆结构是对称的。他的世界图像（Imago Mundi）理论解释称，以赤道线为对称轴，地球上四个大陆，北方和南方各有两个。北方的一个大陆是欧洲，其在南方的对称大陆便是非洲。这两个大陆都位于地球的西半球。而在另一边的东半球，赤道线以北是亚洲大陆。因此，根据戴利的理论逻辑，如果有人朝着赤道线的南方前进，那么他一定能到达亚洲大陆的南部。

^② Tzvetan Todorov,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El Problema del Otro*, Mexico D.F.; Madrid: Siglo Veintiuno, 1998, p. 57.

^③ Carmen Licia Palazzo, *Os Jesuítas na China*, 2019. <http://www.carmenlicia.org/paper/2014/os-jesuítas-na-china-artigo-meu-publicado-na-revista-tuiuti-ciencia-e-cultura/>. [2019-04-05]

究的问题。同样，解释巴西人如何形成对中国人的常识也并非本文的目的。现在，我们最好将常识暂且搁在一边；未来，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一国的常识构建，那就必须用到它。不同社会群体对他人的看法，往往由某些怀有特定目的的人来建构。

问题不仅在于以偏狭的方式理解研究对象，还在于如何避免出现像欧洲“大发现”时期的拉美，以及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一些被建构出来的意象和先入为主的表达，完全扭曲了中国的现实，同时也将扭曲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的中国的未来。从理解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说，现实即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行为的产物。

当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位传教士意识到，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错误意象是阻碍他们更好融入中国社会的真正原因时，他们便停止了对佛教徒的模仿。除了东西方科学知识的交流以外，传教士们之所以能与中国官员走得更近，是因为前者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情况的真实特点。与哥伦布不同，传教士们明白事实真相（历史社会事实）的重要性，以及融入中国社会的原因（形成对现实的新认知）。如前文所述，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戈恩教授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当他们第一次实地接触中国和中国人后，他们随即改变了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认知。

因此，仅仅获取有关一个国家的优质信息还不够，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社会历史认知来分析问题。^①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各种有关知识构建的理论，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共同探究如何以最佳方式，通过理性与知识，去克服在理解研究对象时面临的时空障碍。例如，我们无法与秦朝的中国进行跨时空接触；而即便是在当下，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让所有巴西人都到中国来，看看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

阿基米德的观察法通常有助于理解社会现象，但这一视角终究是“他人的解释”，即外国人对分析对象的看法，因为他们缺乏在特定时空里日常生活的经历。^② 外国学者没有听过祖父母讲中国故事，中国父母也可能没有接触过

^① “ (...) all science would be superfluous if th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the essence of things directly coincided (...)” (Karl Marx, *O Capital - Crítica da Economia Política*, Rio de Janeiro: Ed.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2008, p. 1080)

^②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曾批评现代科学，认为这种阿基米德支点，即从外界向内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科学，并使得科学与真正的现实、标准及测量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阿伦特认为，人类对自己的错误理解破坏了人类与自己的联系。

外国的各款美食和香水；在中国，外国人甚至不明白什么是用筷子吃饭。同样地，中国人有丰富多样的问候用语，例如“你干什么呢？”“吃饭了吗？”“你去哪儿？”，但很少有外国学者知道这些用语不同的含义，他们只知道“你好”。对于一些国家知识的特殊性，唯有当地人能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只有那些日常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明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因此，从研究对象国的国民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一点尤为重要。

对于“真相”，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存在两个真相，分别为研究学者眼中的真相和事实上的真相。因此，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少也存在两个“中国”，即任何一名研究学者眼中的中国，以及事实上的中国。社会学家的目标是尽可能靠近“事实上的中国”并掌握其社会历史构成。

我们对巴西国内知识渊博的中国研究学者和汉学家做了本质上的区分。需要注意的是，“有关特定历史事实的信息”与“对历史事件形成的社会历史认知”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提供的机遇与日俱增，巴西培养出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可能性也在同步上升。宋晓丽和韩召颖认为，公共外交推动了中国和拉美之间最初的接触，能够避免拉美国家对中国的误解。^①但是要培养汉学家，只获取信息是不够的。信息的质量十分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阐明，尽管巴西对“多个中国”意象进行了简化，但自19世纪末以来，巴西学界仍有三个占主流的“中国意象”，分别是：作为千年文明的中国、共产主义中国、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基于前两种意象，在过去几年里一个具备经济和政治能力、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新中国意象又在巴西出现。需要强调的是，每一种意象的建构都存在对现实的误解，但它们的确可以成为有用的学术工具，因而仅适用于知识普及的目的。

此外，这几种意象还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它们只展现了表面上的“真实的中国”。然而如果只通过意识形态分析去研究中国，我们并不能领悟这个国家的客观现实。就好比一名学者的研究目的仅仅是想了解中国经济、政治及外交中的某一方面，那么他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分析就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因此，全面理解一个国家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社会科学分析中常见的错误，即将具体与抽象、特殊性与普遍性相混淆。

^① 宋晓丽、韩召颖：《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演进、活动与效果》，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3-139页。

巴西政治哲学家卡洛斯·库蒂尼奥曾批判法国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认为这种试图理解事物的方式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西方思想界出现“理性的苦难”的罪魁祸首之一。^① 同理, 我们可以说基于经济或文化偏见, 或者仅透过中国古代历史来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现实, 也将是一种“理性的苦难”。因此, 为克服巴西学者在中国研究上的局限, 有必要对恢复哲学传统进行反思。

与中国研究专家相反, 汉学家在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时必须保留其中的历史维度, 他们需要在近五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断裂与延续中掌握社会关系实践的丰富性。正如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 中国的内涵超越其经济、政治、历史等各部分的叠加。因此, 汉学本身也在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便已经成为一名汉学家, 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 以发现在时空维度上定义中国的科学范畴。基于这一点, 汉学家必须明确中国生活方式创造与再创造的历史事实, 避免出现将具体与抽象、特殊性与普遍性相混淆的社会分析。如此看来, 汉学家本身也是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者。

此外, 巴西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sinologist historian) 不应仅仅成为中国古代史专家, 对孔子、司马迁以及唐代诗歌了如指掌, 却不知晓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同样, 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 (economist sinologist) 也不能只关心当代中国经济, 而忽视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如前文所述, 为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除历史和文化外, 巴西汉学家还需掌握中国的经济、语言、政治和地理, 了解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在断裂与延续的进程中实现创造与再创造。

对于巴西汉学的未来, 巴西的汉学家有必要进行连贯的研究, 至少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契合点。中国古代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强调, 学术的目标是为政府和政务培养具有实才实德、心系百姓生计之人。可见, 学术研究影响着百姓生计和社会稳定。为此, 巴西的汉学家们务必克服自身局限, 听从颜元的教诲, 努力成为“有实才实德之人”。此外, 巴西汉学的根本目的, 在于消除因中巴两国生活方式加速变革而产生的相互误解。除“中国精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以外,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巴西汉学家建构对中国社会历史认知的必修课。

^① Carlos Nelson Coutinho, *O Estruturalismo e a Miséria da Razão*, São Paulo: Expressão Popular, 2010, p. 18.

四 结论

早在几个世纪前，外国传教士、学者和记者就形成了有关中国的认知，他们的观点被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此情况下，巴西学者对优质信息的积累必然少之又少，对研究对象也已先入为主。为更好地认识中国，避免误解的产生，巴西学者有必要建构自己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并在没有偏见和预想的前提下将这些知识传递下去。

自 19 世纪末以来，巴西学界始终试图解密中国，因为这是一个与巴西空间距离极远，但命运联系日益紧密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建构了三个有关中国的意象：古代中国、共产主义中国、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一个具备经济和政治能力、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新中国意象也已在巴西出现。

尽管巴西有一部分专家对中国的某些方面了如指掌，他们对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巴西学界距离组建一支有学术连贯性的汉学研究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中巴两国人民正努力优化他们之间的经验和信息交流。知识的局限阻碍了巴西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构成。

同时，本文还就培养巴西汉学家，并使其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性提出了思考。汉学家应当意识到，人是特定时间和空间里集体活动的产物，这一点可以通过辩证的理性思维来理解。中国的整体内涵大于其政治、外交、经济、古代史等表面现象的总和。因此，单纯地获取信息还远远不够，尽管它是理解分析对象时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如今，汉学应当突破其作为欧洲殖民工具的历史起源。如前文所述，汉学也有其发展历史，且应当克服它的起源问题。如果 19 世纪下半叶的座右铭是“知识带来掌控”，那么今天的我们有必要放弃任何企图建立依附关系的尝试。同时，新时代的座右铭将更贴近于“知识带来共享”。

(翻译 贾诗慧；校对 金晓文；责任编辑 高 涵)